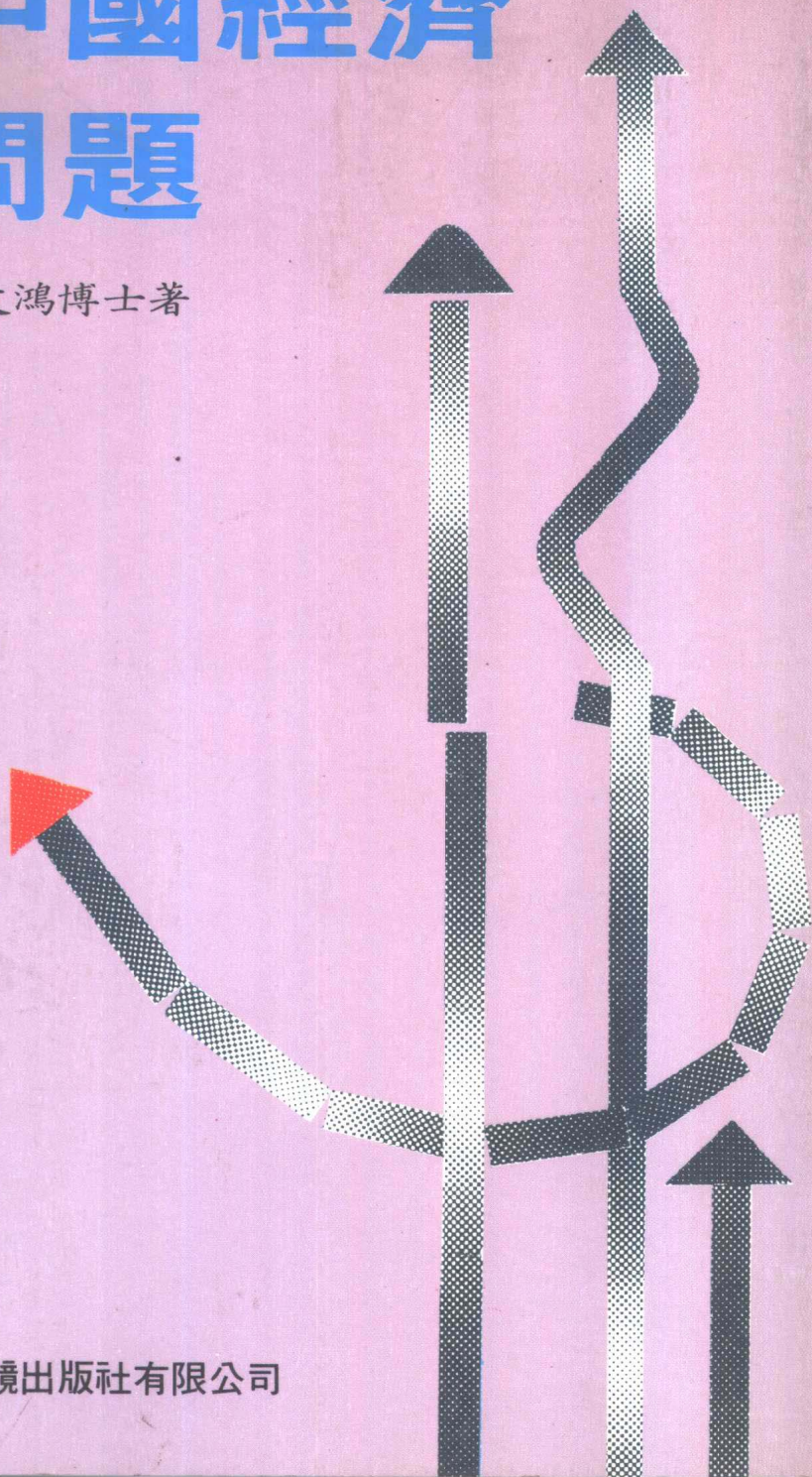


中國經濟 問題

陳文鴻博士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國經濟問題

陳文鴻博士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中國經濟問題

編著：陳文鴻博士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8樓

195-197, Johnston Rd., 7/F. Wanchai, H.K.

Tel: 5-753877 5-757709 Fax: (852) 5-8381079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9年9月初版

定價：港幣70元

書號：ISBN 962-226-263-5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言

收集在這裏的文章，都是在1983年從日本回到香港工作後陸續寫成的。文章涉及的範圍很廣，但基本上都是圍繞一個出發點，就是從分析中國具體的經濟和政策狀況的基礎上，試圖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和道路。文章都是針對個別政策或經濟範疇，並沒有對中國整體經濟發展的問題，提出有系統的討論。不過，在批評現行的政策或經濟現象，以及提出一些政策改變的方向時，其中已經包含了一些比較基本的體制性和方向性考慮，這可代表着我在這幾年裏研究和思考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部分心路歷程。

中國的社會與經濟錯綜複雜，加上近年來變化急劇，要認真地將之研究、分析得比較好，是一件近乎不可能之事。然而，不嘗試比較認真地弄清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趨勢，有關中國前途、發展方向的討論便會流於粗疏武斷。就像國內近幾年的情況那樣，不是毫無原則、違反社會科學的基本準則地主張「全盤西化」，徹底淪為全盤資本主義化；便是變成對任何政府推行的政策作解釋、神化（reification），實際上否定了理論、否定了社會科學以至馬克思主義，使到討論淪為唯政治權力或唯政治權威的主觀唯心論，既脫離中國的現實，也違背了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相對客觀規律。中國改革之陷於目前的困境或危機，基本上便是由於理論上的貧乏。

我不敢說我的研究、我這些文章有什麼貢獻，但至少我願意盡力從中國的現實基礎上進行分析，並且不迷信官方無論是那個權威、那個領導提出來的政策，不迷信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科學主張。囿於能力和資源，作出來的成果可能不大理想；但這樣的方法、方向，我始終堅信，並且堅持。這些文章之有一點價值，也相信便在這方面。

這裏的文章有不少是在《廣角鏡》刊出的，我應該多謝李國強兄催稿的毅力；真的說，沒有他的再三催促，不少文章是不會寫出來的。而今次結集出版，也盡是他的主張、堅持，謹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另外，在這幾年的寫作過程，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幫助，其中曾樹基和胡敦靄兩兄是我主要的討論對手，也是我不少意念的刺激者。梁志仁、周明輝、鄭毓盛、梁啓華君對我的研究工作亦提供了不少的協助，其中鄭、梁二兄更負責我的文稿收集整理工作，在此謹一併致謝。

任何的學術或研究工作，除了有信念的支持和朋友的協助外，要能長期堅持下去，最重要的因素是感情上的支持。在這方面，若沒有我的妻子和女兒的愛情和親情，我不相信我可以堅持多年做這些實際上經常都是枯燥無味、且頗為辛苦的資料整理。故此，我有什麼的成果，他們都有極其重要的一份。

陳文鴻

1989年7月21日

亞德雷德大學

作者簡介：

陳文瀾，一九四九年香港出生。一九七三年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畢業，一九七五年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畢業，獲哲學碩士，一九七八年赴澳洲，入南澳洲斐達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隨匈裔社會學家 Ivan Szelenyi 教授研究政治經濟學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應用和發展，博士論文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工業管理體制。一九八二年離澳赴日本，出任東京法政大學經濟學院的訪問研究員。八三年回港任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從事中國經濟發展和政策變化的研究。

除了學術著作外，經常在香港及海外的報刊雜誌撰寫文章，刊出文字包括中文、英文和日文。且在香港以外有定期的寫作專欄。

在研究和寫作外，並同時為中國經濟研究諮詢有限公司負責人，編輯出版《香港中資公司名錄》、《中國經貿文摘》、《中國最新統計》等定期刊物。

目 錄

序.....	i
中國經濟調整新動向.....	1
中國鄉鎮工業的問題.....	27
中國煤炭能源開發的布局問題.....	61
進口替代還是出口導向？ ——工業化發展戰略的考慮.....	86
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及其影響.....	100
中國的外貿體制改革.....	115
中國經濟發展新形勢.....	127
中國經改進行結構調整 評七屆二次人大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	145

中國經濟調整新動向

從中共「建議」看中國形勢和對策

9月23日，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建議》。這份「建議」不僅將是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制訂第七個五年計劃的根據，決定從明年（86年）開始的五年裏，中國經濟和社會政策的基本做法，「建議」同時反映了中共中央對目前的經濟社會形勢的認識和估計，和在這個基礎上，它所採取的政策。

由於「建議」提出的只是制定「七五」計劃時所應採取的一些原則，具體的內容，或執行的方法、措施還有待國務院制訂的「七五」計劃書來說明，故此，我們不可能，也似不應該就「建議」來評論「七五」計劃。本文的目的，只是就「建議」有關經濟政制方面的提議，結合中國目前的經濟情況來討論，中共中央是怎樣理解目前的經濟形勢，會採取怎樣的對策，以及這樣的對策是否能足夠地克服現存的經濟問題。我相信這樣的討論會幫助我們了解短期內中國經濟政策的趨勢，以及「七五」計劃。

「七五」計劃爲「改革」鋪路

趙紫陽在有關「建議」的說明裏指出，「七五」期間的任務主要有三條，但是最重要的是第一條：「爲經濟體制的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使改革順利展開，基本上奠定新的經濟體制的基礎。」^①這樣的提法有極深的意義。既然改革需要有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才可以順利展開，改革本身便不可能會自發地創造出良好的經濟環境。或者，至少在目前新的經濟體制還未奠定基礎時，不能說改革便一定帶來絕對的經濟改善，改革還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才可以發揮其經濟效力，改革也就仍然受到其它因素的制約。

趙紫陽說：「從基本上說，改革是爲建設服務的，從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來說，建設的安排要有利於改革的進行，爲了給改革創造好的經濟環境，我們一定不能片面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不能脫離國力的可能盲目擴大建設規模。」^②

一條建設的規律

從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來說，制約改革的主要因素便是建設。換言之，改革的進展、方向不能夠違反建設的規律，否則會給改革本身的發展，制造障礙。在黨代表會議通過的「建議」也清楚明確地指出，「七五」計劃的第一條基本指導原則是：「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互相適應，互相促進。」^③要緊之處不是把改革放在首位，而是怎樣使改革和建設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適應、互相促進。在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放在首位是有條件的。實際上，最要緊的

一條基本指導原則，不是改革，而是建設的規律。

這條建設的規律便是「建議」所提的第二條基本指導原則：「堅持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基本平衡。使積累和消費保持恰當的比例。這裏的中心問題是根據國力的可能，在妥善安排人民生活的同時，十分注意確定合理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做到國家財政、信貸、物資和外匯的各自平衡和相互間的綜合平衡。這是保證經濟比例關係協調，經濟生活穩定和體制改革順利推進的根本條件。」^④ 這條原則也即是陳雲自五十年代以來，一直提倡堅持的「國力論」、「綜合平衡論」（包括三大平衡或四大平衡論）。陳雲這些主張的理論根據，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規律。^⑤

綜合平衡在經濟活動反映出來的最主要指標，是經濟的增長率，包括了建設規模和建設速度的直接反映。要維持綜合平衡，便需要確定合理的建設規模、建設速度，因此，只能有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長率，不可能是「高速度」。

「建議」說：「爲了改革的順利進行，必須合理確定經濟增長率，防止盲目攀比和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速度。」但是，怎樣才算是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呢？

早在今年4月，趙紫陽在會見丹麥外交大臣時說，「中國把經濟發展的速度降下來不是對經濟發展進行急剎車和大調整，只是爲了防患於未然，爲了使中國經濟能夠穩定、持續地發展，使經濟發展有一個正常的速度，也就是一個適度的高速度而不是超高速度。」^⑥

不過，趙紫陽沒有明確地指出怎樣的增長率才是「適度的高速度」。84年中國工業的增長率是14%，社會總產值是13%^⑦，85年第一季的工業生產增長率是23%。當時《經濟參考》便有文章指出這是「歷史

上罕見的『超高速』增長」，以為「應引起各方重視」。^⑧看來趙紫陽所指的超高速度應該是本於此，而他的「適度的高速度」應低於此數，或許便是84年的13—14%的水平。

什麼是「適當的高速度」？

6月，《經濟參考》「論壇」指出：「從速度上看，大體上說，10%左右的（工業）增長速度是我們所能支持的。」這樣的速度顯然比4月趙紫陽提出的為低。這樣的改變，反映出中國領導層內對什麼是「適度的高速度」，或合理的經濟增長率，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而有頗為激烈的爭論。《經濟日報》一篇評論員文章足可反映出這場爭論。文章說：「盡管在前一段時間裏出現了『超高速度』，那是特定條件下出現的，是可以糾正的。既不能把它和『大躍進』類比，也不能由此得出否定要有一個正常速度的結論。」^⑩

有關經濟增長率的爭論，在今次黨代表會議通過的「建議」裏，是一個關鍵性的爭論。因為正如上述，這不單是經濟增長率的問題，而是反映到改革與建設的關係，改革與建設孰主孰次的關係。只有解決這個問題，「建議」才可以提出有關「七五」計劃的具體安排的原則、步驟。此所以這個爭論需要在政治局常委的層次才可以得到解決。

常委同意降慢增速

鄧小平在黨代表會議的講話裏說：「『七五』期間，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增長率定在百分之七左右，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通過的」。^⑪陳雲也在講話裏提到

這百分之七的增長率，並說：「這個速度比較適宜，執行中可能超過，但主觀上不必再提更高指標。」^⑫ 李先念在閉幕詞裏也說：「只有能夠長期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的速度，才是真正有全面實效的高速度。」^⑬

從6月的10%降至7%，雖說估計執行中可能超過，只提7%作為指標，顯示出要求經濟增長速度降慢，經濟發展強調綜合平衡的主張取得了主流地位。由政治局常委一致通過，再在黨代會上，由鄧小平，陳雲正式表態支持，可見這個問題已經作了結論。因此，「建議」才可以根據這個指標，也便是依照這個指標背後的經濟主張，來制定出有關「七五」計劃的原則和步驟的建議。

增長率的問題

政治局常委一致通過，並經全國黨代會正式通過的7%的經濟增長率，雖說是屬於「七五」計劃，由1986年開始，但這個增長率反映了中央領導層對85年經濟形勢的估計，也同時影響著85年餘下時間的經濟政策。

李先念在「閉幕詞」指出：「因為今年的經濟發展速度過高，要在明年轉入正常的速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⑭ 這段話有兩種意義，一是今年經濟發展速度過高，已經帶來了問題。這些問題正是今年以來有關經濟增長率爭論的關鍵之處，也因此才有7%的正常速度的確定下來。二是怎樣去銜接今年的過高速度與明年要開始轉入的正常速度。

正是由於這兩重意義，「建議」提出要把整個「七五」計劃分成兩個階段來進行。

七五計劃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七五」計劃的前兩年，86和87兩年，「要著重控制社會總需要，解決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和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的問題。在保持1985年固定資產投資總規模的條件下，作一些小調整，改善投資結構，加強重點建設。」依趙紫陽的說法，「這樣用兩年多的時間逐步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比在今年下半年集中解決效果要好些，可以避免剎車過急而造成的損失和震動。」^⑮雖說只是作一些小調整，但顯然從85年最後一季到87年為止，應該算是經濟調整的階段，目的是通過調整來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也即是從84年下半年以來「超高速度」造成的問題。

第二階段是88年開始的三年。但是即使這三年，也不是大事擴展的時期，趙紫陽的「說明」說：「後三年，再根據情況，適當增長建設投資。但對建設總規模仍需進行必要的控制。」這是從基本否定了84年下半年以來的「超高速度」，把經濟的綜合平衡看作是經濟發展的一般原則，趙紫陽稱之為「多年來的重大歷史經驗」，不單只是經濟調整期內緊急措施、特殊性的原則。

由於「七五」計劃分作這樣的階段性發展，趙紫陽也表示：「改革也大體上參照這兩個階段來安排，這樣做比較積極穩妥。」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因此分成三步來進行。根據「建議」，這三步如下：

1. 「在前幾年擴大企業自主權和直接控制有所減少的基礎上，今後一兩年內要在繼續搞活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同時，着重在從宏觀上加強經濟活動的間接控制方面下功夫。」

2.「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認真搞好生產資本價格體系和價格管理制度的改革，進一步完善稅制，改革金融體制。」

3.「逐步建立同新體制相適應的組織機構，……最終實現政企職責分開。」^⑩

雖說這些步驟是「互相銜接、互相交叉」，第一步應該是「七五」期內最初一兩年的主要改革工作，實際上是呼應建設方面的安排，加強改革的宏觀控制，即是經濟調整的主要配合工作。改革的第二、三步相信只能在87年之後才可大步展開，到時也不能不受建設的綜合平衡所制約，不會全面地鋪開來進行。要完成這兩步，相信也不能在「七五」期之內。

趙紫陽在「說明」中也指出，「七五」的前兩年，「改革的重點要圍繞穩定經濟的要求，從宏觀上加強、完善間接控制體系」。後三年，則要進一步加強間接控制，搞好上述第二步的改革。86、87年兩年的「調整」、「加強宏觀控制」的重點清楚明確，這是不明言的「先調整、後改革」，或「調整為主、改革為次」的論調。

當前存在什麼問題？

「建議」把「七五」計劃的頭二年列為經濟調整的階段，以兩年多的時間來逐漸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雖然趙紫陽說目的是分散解決，以避免由於利車過急而造成的損失和震動，但用兩年時間來穩定經濟，解決問題，顯然問題並不簡單，也頗為嚴重。上一次公開的經濟調整是1980年，那時提的是三年以至五年的調整期，今次的情況應該沒有那時的嚴重，但也不容中央領導輕易視之。

究竟當前存在的問題是什麼？

趙紫陽的「說明」解釋爲：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和消費基金過猛。「建議」則說：「當前經濟工作中還存在着經濟效益提高不快，生產技術進步緩慢，經營管理水平低、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特別是1984年第四季度以來，工業增長速度過快，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信貸資金和消費基金增長過猛，部分商品價格上漲過多，國家外匯儲備下降，經濟生活中出現了某些新的不穩定因素」。^{①⑦}前一部分是中國經濟長期以來的問題，經濟改革的目的是克服這些問題，可惜的是，這些問題在經濟改革的幾年後仍然未有改善。後一部分是當前存在的問題，對當前經濟穩定發展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問題有兩大特點

這些問題有兩個特色：第一，這些問題的出現不是在八四年第四季度，而是更早。第二，這些問題都屬結構性的問題，不是僅僅屬一些政策或措施失誤產生的暫時困難。因此，這些問題對中國經濟結構都有着深重的影響，它們的嚴重性和直接威脅也在這裏。

要了解這兩個特色，國家統計局在檢討「六五」計劃的執行情況時，便提出了發展中的四個問題，這四個問題的解釋，正好作爲這兩個特色的注腳。^{①⑧}

第一個問題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國家統計局指出從1982年開始，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連年激增，與上年相比，82年增加178億元，83年107億元，84年233億元，85年預計增加300億元。增長趨勢並不局限於84年第四季度以後，而是從82年開始，連續四年，差不多貫穿着整個「六五」計劃，

只不過，84年開始速度加快。

問題不僅是投資規模越來越大

問題不僅是投資規模有越來越擴大的趨勢，更且有效果不好，資金浪費之嫌。如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由80年的79.1%下降至84年的71.8%。「六五」計劃規定建成投產的基本建設大中型項目共400個，前四年只完成了計劃內的197個，85年一年內不可能如期完成。又如基本建設竣工房屋建築面積，近幾年為每年1.3億至1.4億平方米，還略低於80年的水平。

商品貨源與購買力差額擴大

第二個問題是「商品貨源增長趕不上社會購買力的增長」、「六五」期間，農業和輕工業持續增長、市場貨源有頗大的增加，「但近兩三年由於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更快，加上社會集團購買力大量增加，以及固定資產投資中約有30%要轉化為消費品的需求，形成消費基金膨脹，市場零售商品貨源同社會購買力的差額擴大。」^{①9}

運輸緊張狀況加劇

第三個問題是「運輸緊張狀況加劇」。例如，84年末，全國民用汽車擁有量比80年末增加48%，同一時期公路里路只加了4.7%。即使各種運輸的客貨運量都能全面超額完成「六五」計劃，仍然追不上經濟發展的需要，結果便是：「現在，不但積壓待運物資增多，旅客列車也超員嚴重，主要鐵路幹線普遍存

在買票難、乘車難現象。國內民航線全面緊張，公路建設落後於車輛流量的增長」。運輸已經成了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阻礙。

重工業內部結構不協調

第四個問題是「重工業內部結構不夠協調」。80年至84年，採掘工業產值平均每年增長3.9%，原材料工業增長5.8%，大大地低於製造工業產值增長的10.4%。因此，「不得不花大量外匯進口鋼材、有色金屬、化纖等原料，彌補國內生產的不足。特別是近年來，社會總需求膨脹，刺激工業高速增長，有些企業片面追求產值、利潤的思想有所抬頭，產品質量下降，前幾年已淘汰的技術落後的機電產品和小高爐、小煉焦爐、小煉油廠等，有些又恢復生產。這種狀況，不利於產品結構的調整和技術的進步。」

從這四個問題的解釋來看，82年所宣稱經濟調整的工作大致完成，經濟比例關係大致理順的情況，在過去三年裏又重新失去，這四個問題的存在和在85年逐步加劇，正顯示出，由於加快經濟的增長率，却同時缺乏宏觀經濟的控制，經濟增長出現了不平衡的趨勢，因而導致中國經濟再次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失調。

今年5月，經濟學家吳敬璠等便已經提出警告：「光有農、輕、重三個部門之間的協調，是遠遠不足夠的。第一、它並不包括工農業生產部門同交通、郵電等現代生產不可缺少的基礎設施，以及各種服務業之間的比例關係。第二、它也沒有反映工農業內部各部門之間，如工業與能源、加工工業與原材料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②⑩}從上年到今年初農工之間的表面協調，輕重工業之間，輕工業總產值超越重工業總產